
理论概括、历史生成与现实意义

——论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彭冰冰¹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习近平对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提炼与概括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自信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的,是与党的优秀传统文化一致的,也是在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中一以贯之的。作为一种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形式,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变迁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仍然是推动浙江改革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 红船精神 浙江精神 逻辑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 D261. 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5-0056-06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蕴含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习近平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浙江精神彰显的是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精神风貌。习近平将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从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理论概括、历史生成以及现实意义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一、理论概括: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凝练体现了习近平对文化力量的高度重视

无论是对每一个体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一种文化存在物。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替自己创造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文化的发生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最蹩脚的建筑师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建造房屋之前就已经通过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在头脑中设计好了房屋的图案。人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潜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而实践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根据,不仅包括满足人的肉体需要的物质生产,还包括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

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意义,但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把精神生产视为人的真正的、自由的生产。没有精神生产,就没有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没有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产生和进步。精神生产可分为自发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和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两个层次,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意识形态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越来越重要。费孝通认为,文化自信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如此看来,文化自信对于社会发展变革

¹作者简介: 彭冰冰(1979-),男,江西遂川人,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VSZ10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NDJC155YB)。

时期尤为重要,它具体表现为人们进行文化选择和建构时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决定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塑造人的理想信念、规制社会伦理道德,将人的情感和欲望控制在合理的价值规范内。也就是说,价值观诠释、体现和表征的是文化的本质、发展趋向和目标。核心价值观反映的是一个民族所追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最高理想。因此,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阐释,迫切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社会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完全是无意识的,那么整个文化就会在长期的自我封闭中退化甚至衰落。

文化对于一个政党的发展也很重要。任何政党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同,赢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必须不断发展和创新自己的政党文化。政党文化是规范政党行为、引导政党活动、推进政党系统运行的指南。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历来重视用持久的文化精神力量浸润政党建设,善于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凝聚力量。毛泽东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回望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正是因为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才能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历经风雨,从红船起航地嘉兴出发,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最后走向天安门。政党文化既是广大党员在生动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也要通过党员的实际行动来体现。井冈山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长征途中“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延安时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风尚,西柏坡时期“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最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展示着中国共产政党文化中最先进的一面。

习近平历来重视文化的力量。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就提出要“搞好教育文化事业”^{[5]15},“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5]17}。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闽东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阐述了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密切相联”^[6]。在浙江工作期间,他认为,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要注重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7]9}他提出,要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7]48}。他还提出“文化是灵魂”^{[7]149}“文化育和谐”^{[7]150}等论断。“文化”一词在《之江新语》中出现了160多次。习近平首次科学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得党的革命精神史更加系统完整,实现了党的革命精神起点与党的历史起点的一致。他还亲自倡导开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讨论,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8]289}。习近平对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提炼,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正是如此,他把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提供了丰润的文化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涉及“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如何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等多方面,表现了对中华文化发展、道路与前景的高度自信,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可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中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理念与我们党的优秀传统是一致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的。

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日渐加深,也使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消费市场日趋国际化,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指出,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7]149}。塞缪尔·亨廷顿、爱德华·萨义德、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西方学者,都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的诸多变局与矛盾进行解读,甚至“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9]。不管双方争论的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危机和冲突,都有观念、道德、价值、宗教等文化的作用掺和其中。“语言”“宗教”“身份”“形象”“认同”等大量关涉文化的诉求,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诉求。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崛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概言之,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历史生成: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是植根之江大地的具有浙江特色的文化形态

从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历史形成来看,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它们的产生离不开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变迁

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指出,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特有的与此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因此,历史地考察特定形式下的物质生产本身,则成为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精神生产的基础。^[10]“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11]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密探闯入会场,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已经结束,就此而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任何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有学者指出,租界当局对“过激主义”“东方共产主义”等“激进分子”的长期监视和防范,是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必然因素。^{[11]59-90}至于为何选择到嘉兴南湖续会,众所周知,与王会悟的提议有很大关系。但就其必然性来看,这一提议之所以能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与上海与嘉兴之间便捷的交通、历史的联系密切相关。^{[11]100-104}嘉兴一直是浙北重镇,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有效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绅商阶层兴起,革命思想活跃,据考证,五四前后嘉兴有《新平湖》《微光报》《平湖民声报》《新乡人》《新塍半月刊》等各类进步报刊多种^[12],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浙江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也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的。^[13]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催生着浙江人民的现代文明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血脉。虽然因为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物质基础不同,使得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着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但是精神生产不仅依赖于物质生产,也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性质,并有可能在超越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浙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根基和底蕴。有学者认为,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看,“发达的地方教育事业与崇文重学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与自由活跃的思维特征”“开放的文化心态结构与兼容并蓄的人文影响”“‘工巧求新’的社会风气与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这四方面充分体现了嘉兴当地的人文特质与文化传统对“红船文化”的影响。^[14]“创新和实干是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的要义。”^[15]自古以来,浙江人民是极富创造精神的,他们思想解放,从不保守与自封。从东汉的王充、北宋的沈括,直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都是敢于创新的杰出代表。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涌现出沈括、李之藻、张履祥、李善兰等许多科技人才。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涉及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天文学、数学、工程技术学等许多方面都很有建树。创新的理念,不将其付诸实践,不过是空谈。求真务实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早在东汉,王充自觉地批判了虚妄迷信的谶纬思想,提出了注重实知和效验的认识论,认为理论应落实到生活实际中,“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16]。南宋时的陈亮、叶适特别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注意实际问题的研讨,反对空谈和玄想。针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明代大儒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生命历程就是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证明与诠释。这种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都传承着知行合一的文化底蕴,蕴含着务实重干的文化基因。

“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17]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20世纪初,随着浙江民族工业的发展,浙江工人人数也迅速增多。据统计,1900年到1910年,浙江500名工人以上的5个大厂矿就有工人5890人,^{[18]1183}到1916年,全省共有工人79165人,其中男工53263人,女工25902人。^{[18]1247}随着人数迅速增加,工人阶级也开始壮大起来,他们围绕着提高工资、反对工头等进行了斗争,也积极参与了抵制美货运动、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政治斗争,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与高昂的爱国热情,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滋养。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一批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展工农运动、学生和妇女运动等方面都起到关键作用。^[19]对红船精神深刻内涵的概括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¹浙江精神也是来源于群众的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为了改变命运、摆脱贫困,艰苦奋斗、默默奉献,他们敢想、敢闯、敢拼,不争论、不折腾、不虚浮,务实功、重实际、求实效。“民”强则“国”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江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华丽转身的最大动力和依靠。

强调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地域特色,并非要张扬地方本位主义。科学把握红船精神的历史生成、深刻内涵与历史地位,应该秉持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20]要把它放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总问题”中去考察,要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整体谱系中去考察,要把中共一大上海会议与嘉兴南湖会议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考察浙江精神的产生,亦是如此,不能脱离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来抽象认识,正如习近平指出,浙江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2]。当然,强调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地域性,并不是否定它们的普遍意义,它们都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实意义: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是推动新时代浙江改革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虽然客观的生产力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针对一些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社会静力学”的庸俗化观点,恩格斯晚年对人的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系统论述。他强调,我们不能把物质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21]644},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规定着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的共同价值导向,有利于把个人的意志和活动整合转化为社会合力与发展动力。在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只有与人结合起来,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成为‘理想的意图’,并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21]238}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所谓生产力无非是人的实践力量。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人,让文化力量内化为人的精神动力,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明确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22]所以说,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弘扬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对于我们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凝聚作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需要民族凝聚力。在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精神凝聚力是关键,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核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意志和意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变革时期,形成共同的信念和统一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文化的作用。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文化认同。“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23]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内心承诺,它包括在理智上形成共识,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意志上达成共识。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把许许多多个人的情感和意志融合起来,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实践合力。推动早期中国先进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精神力量正是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早期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能视死如归、百折不挠、奋勇向前,靠的正是一种理想目标在支撑,有一种革命精神在激励。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必将成燎原之势。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年代之所以打仗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24]。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支撑、推进和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新时代,我们要继续从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中汲取精神滋养,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

二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推动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协调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离不开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5]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要进一步推进浙江改革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精神,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宽发展思路。从观念更新、观念突围入手,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使创新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价值导向。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互联网时代,各种生产力要素的协同运作日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这种协同运作的效率依赖于管理。而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则是以管理观念的创新为前提的。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精神生产和精神劳动是一种创新的生产和劳动。在新时代,创意、设计、构想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习近平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8]298}。另外,就创新的内在推力来说,同样离不开文化力量。任何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体现的。在新时代,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发挥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引领作用。文化精神是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经济政治制度等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文化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互动过程。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进步,文化进步也促进和体现着社会的发展。40多年的改革实践,不仅深刻改变中国社会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物的占有与消费成为部分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马克思认为,沉沦在物质欲望中的人是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为了让人摆脱物化,从单向度的存在状态中提升出来,从只知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转变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恩格斯说:“文化

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6]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必然是人的生命的全面体现。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随着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人不仅需要物质产品,也需要精神产品,而精神需要是人的需要的高级形态,表征着人的发展状态。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总体性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们要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总之,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是继续推动新时代浙江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赓续红船精神,秉持浙江精神,从中汲取初心的力量,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汲取创新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汲取实干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共产主义是奠基在人类社会规律基础上的逻辑必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永远胸怀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是实干者,也必然是实干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 光明日报, 2005-06-21 (03).
- [2] 习近平.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J]. 今日浙江, 2006 (3): 4-6.
- [3]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 15-22.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497.
- [5] 习近平. 知之深爱之切[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 [6]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22.
- [7]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8]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 [9] 亨廷顿, 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8.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46.
- [11] 本书课题组.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 [12] 凌冬梅. 嘉兴近代进步报刊史[J]. 浙江档案, 2017 (6): 52-55.
- [13] 彭冰冰. 论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基于总体性方法的解读[J]. 观察与思考, 2017 (6): 94-102.
- [14] 张玉奎. 试论“红船文化”的人文意蕴[J]. 嘉兴学院学报, 2003 (3): 125-128.
- [15] 车俊. 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 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浙江日报, 2017-06-19 (1).

-
- [16]黄晖. 论衡校释: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1183.
- [1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08.
- [18]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 [19]曾林平. 浙江籍先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特殊贡献[J]. 中共党史研究, 2000(6):28-32.
- [20]彭冰冰. “红船精神”内涵的总体性解读[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23-27.
- [21]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2]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24-125.
- [23]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何锡章, 黄欢,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12.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5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111.
- [25]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86.
- [26]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92.

注释:

1 2005 年 1 月至 6 月, 嘉兴南湖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如何弘扬“红船精神”的大讨论, 并向社会征集有关“红船精神”的表述语。广大群众踊跃参与, 共提出了“开天辟地、坚定信念、劈波斩浪、扬帆引航”等 663 条表述语。习近平对此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他专程派人到南湖区进行调研, 在调研基础上, 再集群众的智慧, 对红船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阐述。